

《经典关系》作者莫怀戚

观念推理小说经典

电话有无 录音装置

莫怀戚 // 著



群众出版社

观念推理小说经典

电话有无 录音装置

莫怀戚 /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电话有无录音装置 / 莫怀戚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 2003. 5
(莫怀戚观念推理小说经典)

ISBN 7-5014-2935-9

I . 电 … II . 莫 … III . 推理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6398 号

电话有无录音装置

莫怀戚 著

责任编辑: 张小红

封面设计: 王 子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b.com

信 箱: qzs@qzcb.com

印 刷: 北京东远新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196 千字

印 张: 8.625

版 次: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4-2935-9/I·1244

印 数: 0001—5000 册

定 价: 13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我写侦探小说(代序)

莫怀戚

我写侦探小说，是为了赢得读者。可读性一直是我文学创作的首选前提——在文学作品尚未市场化时就是如此。没有形式美，人们则很难认识其实质之美。好比某人的外观使你根本不愿接近，你怎么知道他(她)的心灵之美呢？

24年前恢复高考，我从剧团考进中文系，一心主攻剧本，准备回团当编剧。但当我的编剧功夫接近圆熟之时，舞台剧无可奈何地被冷落了。许多专业编剧赋了闲。

我改写小说。写剧本的人来写小说，有走下坡路的感觉：轻松，但不过瘾。幸好当时还很走红的纯文学(小说)在写作时能品尝到语言之美感，渐渐地也爱上了。小说使我在文坛上有了 一席之地。这种情形持续了十年。

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，纯文学(小说)的情况也开始不妙。总之你认为写得挺棒的，在挺有名的期刊上发表了，甚至还获了奖，然而很少有人读到。很明显，心性浮躁的现代人对可读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了。

这情况让我开始写侦探小说。因为这种小说精彩、刺激、有悬念。福尔摩斯自不消说，进大学后开始喜欢英国的克里斯蒂和日本的松本清张。前者的内心世界剖析、后者的情节铺陈让我佩服，我决心将两种长处结合在我的身上，而且增加文化气



息。我希望我的侦探小说比我读过的那些“软”一点，或者说，我要将纯文学的情调移植过来。

以上可算文学方面的原因。而现实的原因是，只有到了现在，中国才有了写侦探小说的气候。

二十多年以前中国人过着划一的简单生活，人的欲望是被锁住的。不论犯案、定案（定性）还是破案，都相当低级，有些案子根本就没有去“破”，而是“说”了就算数。这一切别说不能给侦探小说形成土壤，你就是凭天才的大脑编圆了也不像。

现在，市场经济大潮涨起来了。这大潮中有两条特别生猛的大鱼，一条名叫钱，一条名叫性。

钱本来比较简单：它只是人的对象。但由于人们都想得到它，绞尽脑汁，花样翻新，它就给弄得很复杂了。

性本来就复杂，因为它的载体是人。性绝非仅仅是肉体的交合，它后面有一块深广皆不可测的世界——情感。

钱和性还要互相勾结，兴风作浪。

这是一方面；另一方面，随着高科技进入生活，生活便多了许多隐蔽性和不确定性。重庆流行着一则笑话：某主编同妻子用手机通话，一个说在沙坪坝，一个说在江北，结果打着打着，在解放碑打了照面。

复杂而高级的社会生活是侦探小说的土壤，这是不需要论证的结论。

但我一开始写的并不能叫侦探小说，我自己给了个界定，叫心理推理小说。大致意思是，根据人的心理特点可以推断出他（她）在什么情况下将如何行事。我如此定位，旨在避开克里斯蒂和松本清张，同时让小说更“文学”而非更“案件”，这样当然有点犹抱琵琶，但在纯文学惯性还很强大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居然引起了“高层文坛”的注意，认为是“小说新样式”。

但渐渐地,读者不满意了,认为破案者没有动起来。这样说的人多了,对我的影响也就大了,写法做了改变,成了现在这样子,而且保持了七八年,说明这是读者较能接受的样式。

我受先贤“文以载道”的影响很大,所以尽管在课堂上大讲小说的娱乐功效,自己写时还是特别注意其教化作用,希望我的侦探小说能够警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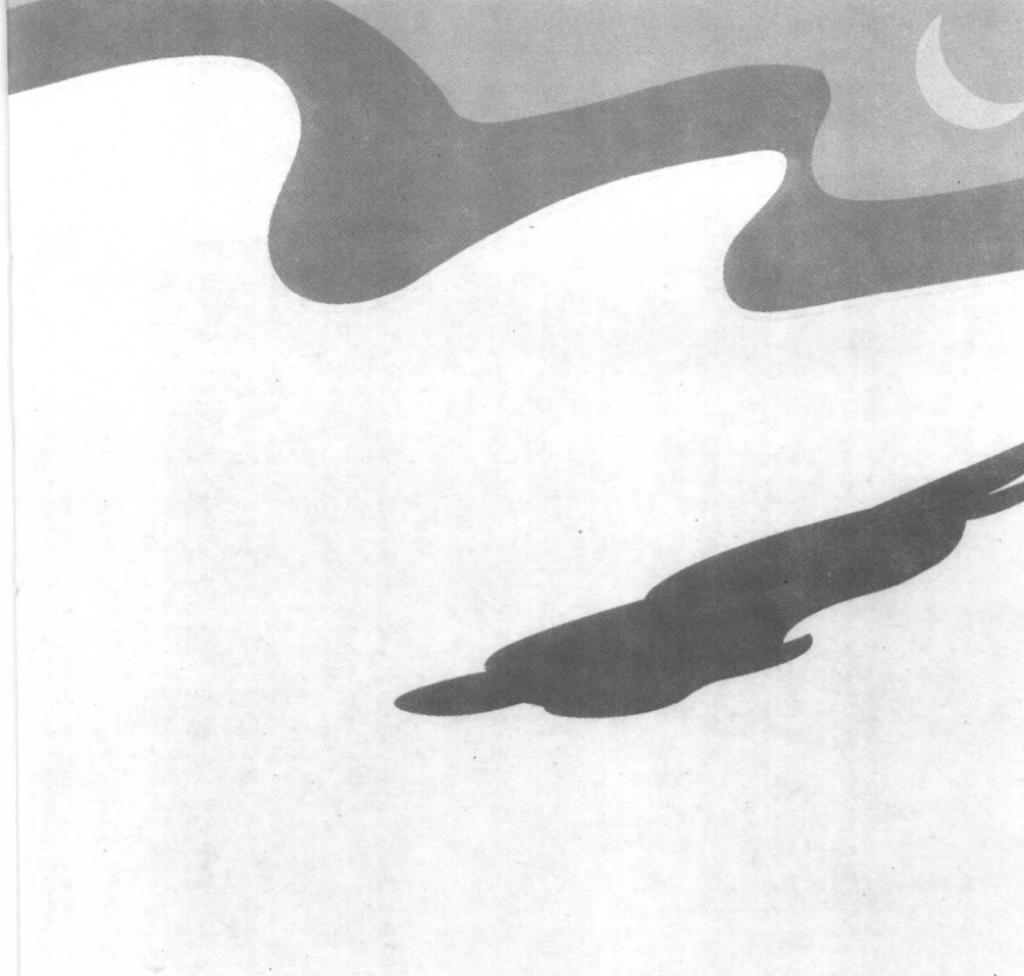
写这种小说相当苦:作案既不能低水平(有些小说被编辑冠以“高智能情杀”之类称谓),破案更得道高一丈,以至于我的家人已听惯了我的叹息:“自己破不了自己(作)的案。”

另一苦是:要将情调同罪恶糅在一起,决非易事。情调往往是“反情节”的,而罪恶则必须依赖情节。我希望自己的小说是优美的文学作品,而非公安局里的卷宗。这与其说是为了读者,不如说是为了作者——他需要作品的优美来产生文学创作的乐趣。

因此也可以说,有苦才有乐。

最后要说的是,我写侦探小说,侧重于伦理方面的思考。时至今日,国人的观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价值观的多元化导致伦理上的大松动和多种矛盾的尖锐化。不尖锐无以导致伤害,无伤害无以导致侦破……于是,倒推回去,伦理的思考也就出来了。话虽这么说:“各有各的活法”,还是应该有合于大多数人利益的客观准则的。

我有三个弟弟:一个是刑事诉讼法教师,一个是外科医生,另一个教药剂学。而我的母亲早年是学法律的:亲人们的帮助是我侦探小说的重要成因。



电话有无录音装置



深夜，近十二点，大律师送走最后那位千恩万谢的咨询者，收文件，锁保险柜，准备回家时，电话铃响了。

是好友，重庆《渝州唱晚》总编武耀打来的。“喂，”他说，音量很大，耳膜都要给冲破了，“这里死了一个社会名流，你听好了！”

“嗯。”大律师按下录音键，“是谁？快快道来。”（大律师喜欢研究录音，这简直成了他的嗜好——他的理论是：录音，比当面倾听更显客观真实，因为可以不受谈话人表情的干扰。）

“是枇杷山心脏康复中心的主任。”

“戴伯海？海心子？”大律师冲口问道。虽说这是一个“怪事成几何级数增长的时代”（大律师本人语），但听说这条维系着许多“昂贵生命”的生命说没了就没了，大律师还是有些吃惊。
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一屁股坐下，从办公桌下面抽出一本备忘录。凡是重要的社会名流，大律师都从自己特有的角度，一一建立了个人档案。

戴伯海，男，现年36岁，原籍上海，父母在抗日战争期间迁来重庆。有众多海外关系，其中叔父在美国，所以，1981年戴伯海（其时已在重庆外科医院任住院医生）去美国密执安州托利多医科大学深造，1985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。当时托利多医科大学和美国的几家医院均曾恳切挽留，但戴伯海还是回来报效祖国，所以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四川日报》和《重庆日报》都曾予以报导。然而戴对这些颂扬均不予理会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我只是舍不得长江流域的女孩儿！”这句话，被《渝州唱晚》从“故乡情”的角度登出，戴对此一笑了之。

1985年，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叔父给了一笔钱，戴用其在重庆市中区的枇杷山北麓买下园林局的一片小院，建成自己的私人医院，即枇杷山心脏康复中心。戴伯海医术高明，工作认



真,有敬业精神,收费很高,所以中心后来事实上成了一所“贵族医院”。

关于戴伯海之死,武耀的电话是这样说的:

昨天(5月24日)晚上,戴酒醉后回自己医院,大约是贪捷径,所以走了燕子岩,在穿过外贸大楼工地时,摔下岩坎死亡。

“就是说,是自己意外死亡?”大律师问。用意很明显:有没有他杀的可能。

武耀当然明白他的意思。“当然不能完全排除他杀可能,才一天嘛,但刑侦方面是这样初步认定的。”

“单兄是这样说的?”刑侦处长单延昭也是他的好朋友。此人常借大律师之力破得悬案,因此被上级认为“业务能力特别强”。对此三人都感到好笑,但都不说破,只是如果单延昭破悬案有了奖金,立刻全部拿来大家下馆子。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。

“就是他想听听你的看法嘛!你听他说吧。”原来单延昭就在武耀那里。

单延昭的意思,如果大律师没有异议,就准备以自己意外死亡向上级报告了。其依据:

一、戴伯海身上没有任何外力致伤痕迹;

二、他身上以及现场均无搏斗痕迹;

三、致死的主要原因,系摔下后头部着地,碰在乱石上。石头已落实,确系工地上本来的乱石;

四、尸体已经解剖,没有发现中毒,如果说有,那就是——酒。血样化验表明,死者吃晚饭时饮酒相当于半斤老白干;

五、尸体上价值一千多元的金表尚在,身旁手提包里有一千多元人民币和五百多元美金,都没被动过。

大律师沉吟。

单延昭说:“这位老兄也是该死了。喝醉了酒,又去走那样

的险路……”

冷不防，大律师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醉了？”

“法医化验——”单延昭说到这里噎住了。

恍然大悟——化验只能说明喝了多少酒，却不能说明是否已醉。酒醉，这种纯粹的主观感受可不是化验能够下结论的。有人喝了一斤不醉，有人喝了一两就醉了。同一个人，有时喝了八两不醉，有时喝了二两就醉了。

电话两边沉默了。似乎都知道，从“你怎么知道他醉了”这句问话开始，一件事情重新起了头。

一刻钟后，单延昭的北京吉普开到。三个人去现场。

现在回头说：其一，大律师并不是律师，是个心理学家，擅长“应用心理学”——他自己这样命名的，以区别于诸如“社会心理学”、“伦理心理学”、“婚姻心理学”、“生命心理学”等等学者写给学者看，学者照着学者抄的心理学。其二，他开办了一个社会咨询窗口（叫公司也行），替人出谋划策，排疑解难，戏称“第四律师事务所”——其时公立的律师事务所只有三个。开办八年以来，处理问题不计其数，致使他本人不知不觉地洞悉了重庆的社会生活，成了一个辞典式的人物。其三，武耀、单延昭与大律师，早年是一同插队的知青，后来武耀与大律师又成大学同学。总之，所谓“三位一体”现象，这里就可见到。武耀是某高干的儿子，但毫无纨绔之气，反倒时时不自觉地现出可掬憨态，所以很得两个朋友喜欢。而且武耀文笔极好，否则怎能当总编。

刚才电话将结束时，大律师自语似的嘀咕道：“像戴伯海这样具隐蔽型人格的人，不大可能饮酒过量。”而单延昭也明白过来，自己在潜意识里，认为戴伯海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是没有什么酒量的。对于干刑侦的，这种先入为主的习惯性潜意识是有害的。



燕子岩工地是重庆旧城改造项目之一。工地在枇杷山南麓，在此可以看见长江中巨大的沙石之洲珊瑚坝。工地隔在上半城干道中山路和下半城干道滨江路之间。工地东端的那条小路倒的确是中山路同滨江路之间的捷径，大约有 50 米，很危险：一边是土壁，一边是岩坎，高约 20 米（建设中的山城重庆，这样的地貌很多）。但这小路还是有两尺来宽，只要不下大雨，还是可以轻松走过去的。戴伯海的摔死，是在大雨后，小路的确比较滑。可只要头脑清醒，稍加小心一点，也不会出问题。

路灯呢，倒是有的，但往往坏了不能及时换上；也有淘气的孩子扔石子儿打灯泡。总之，戴伯海摔死时没灯。他的尸体，是在午夜近 12 点时，巡逻的联防队员发现的。“用电筒顺手这么一照，就发现坎下躺着一个人。”一个队员说。

戴伯海昨天下午 6 点，跟平常一样，下班出了康复中心。他住在哪里，中心的 12 名职工谁也不知道。“作为医生，不愿在休息时再被病人打搅，所以不但住址，就是连电话号码也不告诉我们。”负责警卫的大个儿赵姓年轻人说道。

结合现场调查和法医结论，有几点可以认定：其一，戴死在晚上 9 点至 10 点之间；其二，死时刚刚吃完饭（根据胃里的食物判断）；其三，是从滨江路往中山路走（即从下半城去上半城），那么，晚饭很有可能就是在滨江路上吃的。

如是一个人吃的，就不好说明什么；如是与人共进晚餐，那么，对于食友，就有文章可做了。

单延昭笑笑说道：“死者胃里的食物，我做了记录。当时只注意了有毒无毒，所以对吃了些什么菜，并未留意。现在想起来了，有蚝（即牡蛎）。”

总编武耀不由叫起来：“明白了明白了。生蚝味极美，是沿海的高档菜，重庆引进时间不长，只有极少数豪华酒家才有。我

敢说滨江路上有蚝的，顶多一两家。”

单延昭扭头问大律师：“怎么样？拿上戴伯海的照片，到滨江路一问就知道！”

大律师说：“处长出了蚝的题目，聪明。但我还可以将文章做得更细。可以打赌：第一，戴的晚饭是在‘珊瑚台酒家’吃的；第二，是同女人一起吃的。”

“赌不打，”单延昭说，“因为你从来也没输过。但是，愿闻其详。”

大律师解释：

第一，生蚝是一道佳肴，重庆本地人吃的很少。因为不习惯，同时价钱也昂贵，所以多是来旅游的沿海人以及老外们吃。这些人到了滨江路多去哪里？“珊瑚台酒家”。那里有突出的阳台雅座，可以看珊瑚坝上茂密的芦苇和蒋介石留下的飞机跑道，夕阳下帆影憧憧，渔歌互答，是极其别致的佐餐。

第二，科学地说，生蚝是不大卫生的。蚝喜欢被污染的海水，体内容易长寄生虫。所以作为医生的戴伯海，一个人是决不会去吃蚝的。如是同男人一起，他可以请别人吃，自己推说不习惯就行了。惟有请女人吃饭，只要女人点了蚝，做东的男人是一定要陪着吃的。像戴伯海这种人，不能不讲一点绅士风度。

“嗯，嗯，有道理。”武耀直点头。

“道理倒是有道理，”单延昭板着脸说道，“但是，这也说明老兄经常在外请女人吃大菜呀！”

三个朋友大笑。随后开始对现场进行认真复查。

疑点：

其一，岩坎并不是笔直成九十度的，略有一点坡度。就是说，如果是紧贴路边失了足，身体可以在坡壁上得到缓冲。那么，坡壁上应有擦痕，然而没有；身体落地时也应紧挨岩根，而事



实际上落点离岩根有一米开外。

其二，既然能走到这里来，说明至少不是昏迷状态。那么，失足时，当本能地用手抓抠岩壁，则岩壁上应有抓痕，指缝里也应有沙土。然而都没有。

其三，单延昭说：“感觉上，死者突然受了某种外力，身体弹跃似地离开路面，头部向下直落岩底，身体并未接触坡壁。”另两人点点头。他又说：“而且这外力是加在他的上体，例如颈部、背部、腰部。”两人又点点头。

武耀想了想说：“譬如对面走来一个力大无穷的醉鬼，狭路相逢，那家伙不耐烦地说挡什么道，一边去吧！用胳膊这么一掀，就——”

大律师和单延昭都笑起来。

其四，另一个重要疑点：在小路另一侧的土壁上，发现一个圆洞，大小如汽水瓶盖，深约15厘米。这洞是否同戴伯海有关系，难说。但洞的位置，同戴开始下落处基本相同。这个洞做什么用的？很显然是人用木棍或铁钎凿的。问了工地的人，这洞不是他们打的。三个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第二天，从戴的病人兼朋友，重庆师大数学系教师杭禹处了解到，戴的酒量果然很大。“他，半斤白酒！没事儿！醉？开玩笑！不可能的。”杭禹说得非常肯定。随后，又去了滨江路的“珊瑚台酒家”。果然，那天戴伯海在那里吃的晚饭；共进晚餐的有女人，但不是一个，是——两个。

领班去叫当时负责这一桌的招待时，单延昭低低地说，“现在我倾向于这是一起——他杀。”他友爱地拍了拍大律师。

招待姓周，是个二十出头的美丽姑娘。她看了照片，说：“他们吃的时间比较长。一共要了五份生蚝——先要了三份，后来又加了两份。”“那两个女的都像什么样？”“一个有三十多岁，一个

只有十多岁。像一对中年夫妇带女儿来吃饭……口音？好像都是本地口音。是一起来的，七点半左右；不是一起走的。年龄大的那女的先走，似乎听见她说顶别人的夜班，是我替她要的出租车（车牌？没有注意），过了大约十多分钟，另两人也离席，很匆忙，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。出门后，我又给叫了一辆出租车（也没注意车牌），小姑娘一个人上去了，车往解放碑方向开的。那男的独自步行往两路口方向走去。”

这么说，戴伯海走上燕子岩小路时，的确可能是独自一人。

“吃饭时气氛如何？”

“很好啊！说说笑笑的。要不怎么会吃那么多菜，喝那么多酒呢？”

（很难想像戴伯海之死是出自这样两位女性之手。）

“两个女的是不是母女关系？”

“我听见小姑娘叫妈妈的。”

“听见叫爸爸了吗？”

“嗯，好像没有。”

戴伯海至今未婚。

这里引用师大杭禹的一番话吧。“戴伯海虽然没结婚，但似乎从未断过女人。我曾问他，是不是想自由自在地同众多女人交往，才故意不结婚的。他说哪里，哪里。我碰见过几次他同年轻女人在一起，每次都是——怎么说呢？新人。那些女人都是谁，怎么回事，我是完全不知道！”

“现在，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中，是越来越不管别人的隐私了。”武耀说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杭禹要洗清自己似地连连点头。

大律师一时很有感慨。现在看来，戴伯海当年所说“我只是舍不得长江流域的女孩儿”并非戏言。进入 80 年代以后，“重庆



姑娘很美，已超过上海和苏杭”的说法广为流传。常有外地人流着口水问：“你们重庆的太阳那么大，姑娘怎么就那么白呢？”有的女孩就将头一甩，咧嘴一笑说：“生来白，晒不黑嘛。”

钻进吉普车，单延昭说：“看来，找到那一对母女，很有必要。然而人海茫茫，一点线索也没有，到哪去找呢？”

半个太阳突然跳出云海，车里射进炫目的光，大律师就势闭了眼。一会儿，他睁开眼，慢慢说道：“一个男人请人家母女俩吃饭，说明了什么！”单延昭反应很快，说：“这位母亲的婚姻已不存在。”“对！”大律师说，“否则，就该请全家三人的客。因此，有三种情形：第一，离了婚；第二，男的死亡；第三，男的远在国外——那么这男的定是戴的莫逆之交，委托戴照料自己的妻女。不过，像他这种隐蔽性人格的人，城府很深，行踪诡秘，很难相信会有什么莫逆之交。”武耀问：“扯这些干什么？”

单延昭将车刹住，回身过来对他说：“你真是个曹操！告诉你：我们要清理戴伯海的居室，如果发现有两母女的合影，就可以取来让‘珊瑚台酒家’辨认。”

武耀点点头，明白了（解释：这三个人如同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人物——大律师像孔明，未卜先知；单延昭像周瑜，一见便知；武耀嘛，正如刚才单延昭说的，像曹操，过后方知。不过他的肚量可比曹操大多了）。

大律师补充说：“如果发现近一两年从海外寄来的三四十岁男子的单人照，也不能放过。”

但戴伯海的居处，可以说无人知道，怎么查呢？这可难不倒单延昭——同电信局联系，查戴伯海的电话安装登记。电脑开动，三下两下就昭然若揭（难怪美国汉学家罗伯特 A·柯白说，中国是世界上弄清其公民行踪最快的国家）。除了枇杷山心脏康复中心这个公开地点外，戴伯海别墅似的居处还有三处，都在

市郊的开发区：

南坪开发区的和平村 74 栋 4 楼 2 号

江北开发区的建南村 45 栋 3 楼 3 号

大坪开发区的珍珠村 166 栋 4 楼 2 号

“真是狡兔三窟啊！”武耀感叹地说，“都是一级楼层，两室一厅。”

“这样，同不同的女人幽会，就很方便了！这小子真会过！”单延昭咂了咂嘴说。“显然，是他那些当官的病人替他弄的，”大律师说，“这位医学博士在美国，不但学习了医术，还将美国式的医生与病人互依互存之道也学了来。就是，每次你来，我都可以替你治好，但过不了多久你又得来。”

检查戴伯海的全部照片，吃惊地发现，他竟藏有极多的女子泳装照。数一数，竟有近两千张，都很性感，大约有三分之一放大成了各种尺寸。当然不是一张照片一个女人。但就这样，也可统计出三百多个女人来。

“我的天！”武耀惊呼起来，脸色开始苍白，“三百多，这不累死人吗？”

通过对照片的仔细研究，发现：

第一，戴伯海是个摄影爱好者，水平不低，尤好拍摄泳装女性；被拍摄者，不一定都与他相识，因为有些照片可以看出是用长焦距镜头偷拍的（在他的南坪寓所里设有暗房，全套高级的西德摄影器材也放在那里）。

第二，大律师说：“拍摄泳装女性，可理解为合二为一的目的：爱好、猎艳。其摄影作品，很可能发表过。”果然，在他房间的杂志堆里，共找出二十几本杂志，其上的泳装女照为他所摄，署名为北海。大律师又说：“其实发表了的摄影作品，完全可能成为猎艳工具。说实话，如果未经允许就发表别人的照片，是侵犯